

五大发展理念领航改革发展发展新进程

□陈先春

据和科学判断，是对“十三五”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个总体展望，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实践和探索、通过集体智慧形成的对发展问题的全新认识，是“十三五”时期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各类发展行动的理念先导。深入学习和理解五大发展理念，深入挖掘这些发展理念中蕴藏的深刻内涵，对于更好地促进发展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理念是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发展理念，是对未来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观点和思路的集中概括，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表现。科学的发展理念，应该是一个内涵丰富、内在要素之间逻辑关联紧密的系统，其需要集中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即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实现发展目标的思路和方法是什么、在发展过程中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即发展的着力点有哪些。这些问题构成了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需要着力把握的要害问题的系统认识，形成了一个系统全面的关于发展的理念体系。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既具有每一项的具体发展目标和思路、形成了关于发展导向上的各个子系统，又形成了一个总的关于“十三五”期间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发展方向上的总体体系。五个发展理念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性，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集中回答了我国下一阶段发展过程中的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和发展的着力点问题。

第一，就发展方向而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都是我国发展过程中需要逐步实现的基本目标。同时，在这五个目标体系中，“共享”是这些目标中最为根本的目标，是最终要实现的总的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都是为了实现更好地改革发展，而改革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要实现改革发展成果为人们所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人的发展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导向，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人们所共享，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福祉、加强人民团结和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信心。因此，在五大发展理念中，从整个目标体系而言，“共享”是发展的根本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是实现“共享”这一根本目标的手段。

第二，就发展思路而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成了一个多元统一的发展格局。其中，“共享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如果无法实现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解决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的动能所在。“协调发展”是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

享、增进人民团结，提升全社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和凝聚力的基本保障。“绿色发展”是促进环境友好、追索代际正义、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持。“开放发展”是进一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国内深化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与人类共同发展、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与其它国家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手段。

第三，就发展的着力点而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是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最为主要的几大抓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发展的协调性不够强、环境和资源问题加剧、对外开放水平还不够高、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不足等几大主要问题。因此，针对这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是中央全面深刻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提出的未来一段时间内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几个关键着力点。

综上所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科学的体系，全面回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对下一阶段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开拓发展新局面、提升发展新境界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已经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需要指出的是，从理念到行动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通过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对“十三五”规划建议的有效部署，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奋力前行。

第一，以“创新发展”为导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寻求新的驱动力。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些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和发展危机、经济和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培育不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厘清、经济金融风险依然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等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实现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化解发展过程中的经济金融风险，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以“创新发展”理念为导向，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蔚然成风的创新局面，通过理论、技术、机制和文化等的革新，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瓶颈，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寻

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观点聚焦

“顺应民意”与“顺应时代潮流”缺一不可

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在《光明日报》刊文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重要的政策体系，必须同时做到两个方面的“顺应”，亦即：既顺应民意，能够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又顺应时代潮流，能够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方具有生命力，方具有可持续性，方能具有长远的积极社会效应。不过，人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对于某种重要政策体系有时只是强调其中的一个“顺应”，致使“民意”与“时代潮流”两者有时出现某种脱离的现象，进而使得该项政策体系出现某种偏颇的情形。

所谓顺应民意，是指必须遵循人民性的根本原则，本着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宗旨，来制定相应的重要政策体系。正如邓小平多次强调的那样，“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是判断我们一切政策成效如何的基本标准。而所谓顺应时代潮流，则是指在制定重要政策体系时，必须遵循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原则。

从本质看，顺应民意与顺应时代潮流两者是一致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首先，只有制定顺应时代潮流的重要政策体系，亦即有助于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重要政策体系，方能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提供最为基础的物资条件，方能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其次，只有制定并实施顺应民意的重要政策体系，亦即通过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等有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断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方能使广大民众积极认同发展认同改革，使民众成为改革发展的主体力量。

虽然顺应民意与顺应时代潮流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在制定某种重要政策体系时，两者却会出现某种程度分离的情形。

一方面，有时人们在制定政策体系时过于强调民意问题，将之放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却脱离时代潮流及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比如，在一些发达国家，存在为一大批民众欢迎的高福利政策体系。这种高福利政策体系往往超出了国家财政实际负担能力，降低社会在生产方面的投入，降低社会成员的工作积极性，阻碍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有时人们在制定重要制度政策体系时，脱离广大民众的基本需求如基本民生需求，过于追求不切实际的经济目标。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忽略民意问题，热衷于追求GDP，甚至将之视为“唯一”，从而延误了民生的改善，并使经济发展缺少可持续性。

在“顺应民意”和“顺应时代潮流”两者分离的基础上所制定的重要政策体系，会导致政策体系的重大偏差和失误，对社会发展必定会产生广泛的消极影响，有时甚至会造造成严重的后果。由此，进一步看，应当同时将“顺应民意”和“顺应时代潮流”这两项内容，作为判断重要政策体系是否科学合理的基本标准。

本期特稿

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未来一段时间和国家的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关键阶段，对于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对下一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机制，提供了全新指导，是领航改革发展新进程的行动指南。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没有科学的发展理念，就无法实现科学的发展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发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的核心问题。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局面，要想谋求更为优质的发展，离不开对发展中各种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归纳总结，并据此形成新的看法、思想、观点，进而形成新的更为科学的发展理念，并通过新的发展理念反过来指导发展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繁重的各项改革任务，坚持深化改革发展不动摇，形成了一系列应对现阶段发展中各种问题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三个自信”到“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再到此次全会提出的更为具体的“五大发展理念”，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直面改革发展中的各类难题、敢于革故鼎新破除各种发展瓶颈、善于与时俱进驾驭各种复杂局面而提出的应对现代化事业全局的一系列新看法、新判断。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对“十三五”时期该如何更好地发展提出的更为具体、更为深入、更为全面的指导性意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问题形成的新的理解、新的看法和新的判断。相关报道显示，今年两会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密集到地方、到基层调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调研过程中主持了多次座谈会，听取各个地区主要党政负责同志就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可以说，此次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在反复调研、汇总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个总体把

实践与思考

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目标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作出了一系列具体部署和论述，其中一个重要战略举措就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道德规范转化。这符合意识形态工作规律和道德建设逻辑，值得社科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认真学习研究和贯彻落实。

一、道德的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转化为公民道德规范，才能成为人们日常行为习惯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关系的准则和规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和影响力量，但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其它社会控制和影响力量相比，道德对社会生活的调节作用具有不同的特点。首先，道德是从人们现实利益关系，特别是从人们实际生活中个人对待社会整体利益和其他个人利益的角度，调节人们各种社会行为，在调节范围上具有广泛性。其次，道德以“应当怎样”的道德准则为调节尺度，鼓励不同身份、社会地位和觉悟水平的人们尽力使自己达到或高于目前社会的道德水准，调节尺度具有多层次。再次，从调节方式上看，道德并不诉诸于国家机器和惩罚手段等强制力，而主要以风俗习惯、舆论褒贬、沟通疏导、启蒙感化、宣传教育等软方式进行，注重唤起、激发人们的知耻心和荣辱感，培养人们的道义情感、正义信仰和善善恶断能力，具有渗透性、经常性、深刻性和自觉性等特点。最后，道德总是通过人们言行规范和准则表现出来，与人们的日常言行最贴近，其实践性最强。正是道德规范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成为国家观念上层建筑的重要范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当代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效，一条重要渠道就是要转化为道德规范，通过道德规范的调节作用发挥它应有的导向功能，这不仅有助于解决人们对它的认知问题，更有助于解决人们它对它的践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中央文件《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要求“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加强道德

推进核心价值观向道德规范转化

□李泽泉

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和人们自觉行动”，正是基于道德的这些特点和逻辑而言的。

二、新中国道德规范建设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可以转化为当代公民道德规范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公民道德规范建设，把它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来抓。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和临时代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提出和确立了“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道德规范。其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强调和规定“五爱”作为全体国民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改革开放来，党和国家继续重视“五爱”道德规范建设，相继组织开展了“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等活动，深化了“五爱”道德规范建设。2001年，党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五爱”作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正式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基本道德规范。这20字基本道德规范与“五爱”规范比较，除了“爱国”以外，其他都是新增加的内容，反映了面对改革开放新情况新特点，党和国家继续强调处理好公民个人与国家关系外，开始重视公民与社会、公民与自身关系的规范。党的十八大总结了建国以来意识形态工作和公民道德建设经验，特别是充分吸收了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的成果，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概括提炼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五爱”、“20字基本道德规范”、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内的道德规范建设经验的总结提炼，是对每个公民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国家、与社会以及与自身关系的大整合、大提升，只不过在表达方式上以核心价值观代替了道德规范，但这并不妨碍它对于道德规范建设的实质意义。

从哲学上看，价值与道德、价值观与道德规

范这两对范畴的意义是经常相通的。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有利的、有意义的属性，价值观念是人们对于价值、价值关系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其作用就是判断人们行为是否应当，是否有意义、有价值。可见，从伦理层面看，道德、道德规范、道德价值、道德价值判断这些概念都是表达人们行为的社会正当性。只不过是，道德和道德规范是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行为得失，价值观是以社会效用为标准，通过人们所持有的相对稳定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来判断人们行为得失。在实际中，价值观往往表现为多层次、多维度，但总有一个居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对其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起着统领作用。从新中国发展史上看，无论是“五爱”，20字基本道德规范，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我国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都是为调整公民与国家、公民与社会、公民与自身关系而诞生和发展的，只不过调整层次越来越高，调整内涵越来越丰富。可见，新中国意识形态和公民道德建设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公民道德规范。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公民道德规范转化，体现为公民道德规范建设的总要求、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公民具体行为规范三种形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可以可能转化为公民道德规范，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词就是当代公民道德规范，而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代公民道德规范建设发挥着不同层次的指导和替代作用。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公民道德规范建设的总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相契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总任务、总目标相一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道德相承接，与当代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衔接，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

求新的增长动力，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根本保障。

第二，以“协调发展”为导向，正确处理发展中的各类重大关系。中国共产党人经过积极探索，逐渐形成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理念。然而，在现实过程中，各种不协调的因素依然存在。“协调发展”的理念，就是要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逐步消除一些制约各种关系良性化的因素，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有序。总体而言，一是要通过缩小区域和城乡差距，实现资源在不同地区的合理分配来促进各个地区的协调发展；二是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注重国家硬实力的同时全面提升国家软实力，推动社会文明水平和国家综合影响力的提升；三是要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融合，为改革发展奠定基本的安全保障。

第三，以“绿色发展”为导向，转变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有序协调。一是要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传统产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技术革新、全面发展低碳循环经济、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二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严格规定资源保护和能源消耗标准，推动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三是全面加强生态保护，加强生态环境执法、筑牢生态安全底线；四是要在全社会大力培育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形成促进绿色发展的社会氛围。

第四，以“开放发展”为导向，进一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改革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对外开放与改革发展始终相随，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进一步推动国内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实现“开放发展”的理念，一是要加强国际交流，积极构建互利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一带一路”等新的战略部署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形成新的开放局面；二是在加强对外交流的同时，也要注重提升我国在国际治理中各类话语权，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综合影响力；三是要通过开放引导改革，破除国内一些制约进一步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对外开放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格局。

第五，以“共享发展”为导向，全面实施利益分配的合理化，形成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发展局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全面提升人们生活水平是改革发展的根本目的。实现“共享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推动分配体制的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努力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发展；就需要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加大对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引导形成公平的就业环境，为人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就需要关注人们的衣食住行、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形成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

（作者为省社科联副主席）

了新中国道德规范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民族才有希望。如果说重视公民个人道德建设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那么，选择切合时代要求、合乎当代国情、符合世界潮流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才能把基础夯实。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深化公民具体道德规范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代公民道德规范建设提出了总要求，也提出了基本道德规范，但在实际中，道德对人们的调节作用大量体现在具体行为中，因而需要具体行为规范。所谓具体道德规范，就是不同职业的人、不同场所的人，应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对于道德规范建设，我们党和国家没有细分类型，统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共产主义道德。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形式和人们就业方式多样化，党和国家开始重视具体道德规范研究。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了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要求。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将道德规范分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个具体道德规范，并对这三个具体道德规范的内涵作出了规定，即“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2001年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继承和肯定了这三个具体道德规范的内涵。党的十七大在肯定“三德”建设的同时，提出了加强个人品德建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在强调公民道德、职业道德、家族美德、个人品德建设的同时，又提出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要求，使我国公民道德发展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和传统美德等五种具体规范。但对于个人品德、中华传统美德应该明确哪些具体内涵，官方至今尚未有正式规定。就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具体内涵，也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之前明确的。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道德规范转化，十分有必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重新修改完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规范内容，提炼明确个人品德和传统美德的具体内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体现为人们日常言行的具体规范，便于操守和落实。

（本文系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路径研究[14NDJC190YB]”成果，作者为浙江科技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心主任、特聘研究员）